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1

1987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

刘 大 年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这个题目涉及的范围很广，我想讲四个问题。

- 一，孙中山与“中华民国”源起
- 二，孙中山要建立的中华民国的阶级性质
- 三，中华民国各个政权的考察
- 四，中华民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地位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

一，孙中山与“中华民国”源起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直接相联系，很少人提出疑问。但“中华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从同类性质的政治口号出现，到最后定型化，有一个发展过程。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章程宣布“振兴中华”，“申民智而扶宗国”。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并没有明确方针。大约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在入会誓词上写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团体的革命要求明确表现出来了。尽管“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从历史上不难寻出它的先辈，现在明白地与“创立合众政府”结合在一起，就把过去农民、会党起事的语言，改铸成为资产阶级反满革命的语言了。誓词当然代表孙中山的观点，但没有根据把它看成是他个人单独提出的。参与宣言文告的起草的，有在香港政府任职的律师何启和英国记者邓勤、黎德。香港兴中

会会长为原属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而非孙中山（一说首任会长是香港地方议会议员、富商黄咏商，杨衢云被推为起义后临时政府首脑）。那些人的思想不会与誓词全然无关。“合众政府”按照通常的说法，应当指美国联邦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而解释却有歧义。冯自由说会长名“伯理玺天德”，系英文President的译音，即合众民主国的总统^①；又说，当时有人翻译英文的民主政治Republic为合众政治；“合众政府”与后来的“创立民国”相同^②。这两说就不一致。老兴中会会员谢缵泰1902年发动起义，认为共和政体对中国太先进了，提出“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并采用“联邦”形式。这不是孙中山的主张，但似乎反映了兴中会中一些人对“合众政府”的看法。现在有记载说孙中山在1901年提出了“中华民国”并主张定为国体。不过那只在少数人中谈论，没有公诸于众。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到1903年以前，孙中山在他的革命活动中，多次讲到中国要改行“共和政体”。例如1898年与宫崎寅藏第一次见面谈话^③，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一度与平山周等到上海，试图联合容闳、李鸿章等在南方建立共和政府，等等。那些言论、活动，共和政治的理想坚定不移，却没有具体化，定型化为新的纲领、口号。

决定性的进展来自1903年。义和团运动失败，自立军遭到镇压，帝国主义侵略加紧，国内阶级形势剧变，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向革命转化。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和上海苏报等报刊，公开号召“排满革命”。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章炳麟、陈天华先后在他们的论著中，把推倒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响亮地提出来了。邹容在所撰《革命军》小册子里面，大声疾呼，中国必须以革命手段推倒清朝卖国政府，建立“定名为‘中华共和国’的国家”。他在全书的末尾，高喊“中华共和国万

①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31页；第3集第198页。

③ 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第122—123页。

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①。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批判康有为反对革命的论点，指出当今提倡革命，就要提倡“合众共和”，“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②。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官吏是舵工、水手，百姓是出资造船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③百姓可以撤换皇帝官府，很接近于主张民主政治，不过没有变为口号。两年以后，他发表《论中国宜改行民主政体》，补充阐述了前面的意思。与邹容、章炳麟等人宣传民主共和的同时，1903年，上海江浙等地的“学界风潮”日趋高涨，留日学生拒法、拒俄运动相继爆发。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刻变化，根基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短暂时代已经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正在到来。也就在这时，孙中山把他的革命纲领加以发展，并且定型化了。这就是他在日本青山军事学校汲取学生和同年秋冬再至檀香山改组兴中会所用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④。1905年同盟会经过讨论，它成了这个革命联盟的正式纲领。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口号，是资产阶级开始登上革命舞台的产物，它决非来自与时代背景无关的某种偶然性。推倒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也是全民族利益的要求。因此，它才像惊醒地下蛰伏众物的春雷那样，成为新季节到来，，大地开始活跃起来的口号。

当然，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孙中山在主张共和，创建民国的斗争中，是完全被动的，随大溜的。如果那样，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在革命派里面终于确立起了领袖地位，并且一直保持着那种地位。

① 《革命军》，1928年版第56页。

② 《章太炎选集》，第177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第131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99页。

孙中山在这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极其显著。第一，他是共和主义完整、激进纲领的倡导者。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其他革命组织和革命发起者，各有过自己的口号，但没有可以与孙中山这时所提“建立民国”相比的完整、激进的纲领口号。“建立民国”、“驱除鞑虏”等十六个字，讲三件事：一、推翻清政府；二、建立共和国；三、平均地权。对待这三件事，同盟会里人们的态度很不相同。后来因此有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三民主义的说法。一民主义反满，大家最坚决；二民主义即建立共和国，并非所有人都毫无保留；三民主义讲平均地权，反对的人就多了。实际上并列“平均地权”一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才明确、完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有人主张叫“反满同盟会”，又有人不赞成“平均地权”，要求取消。孙中山解释、强调革命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①。列入“平均地权”，是为“解决社会问题”，革命党要立志远大^②。在那时，唯有这个纲领完备激进，最富革命性。第二，他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坚持者。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提出三民主义，说“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③。第二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讲演，他说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特别批判反满的人抱有皇帝思想，说那种思想会把中国引向亡国^④。同盟会重要分子如张继、章炳麟、陶成章、刘师培等并不这样看。张继、刘师培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名，宣传无政府主义。他们声称推翻清朝以后，就要实行无政府，民国共和政府当然也在取消之列。刘师培忽儿讲不要一切政府，忽儿又讲，如果政府存在，“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47页。

② 《革命逸史》，第3集第132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如专制”^①。1907年，章炳麟写《中华民国解》长文，全在“中华”二字和反满上作文章，没有片言只语阐述民国、共和。他说以前自己也讲过“合众共和”的话。那不过是人云亦云，“随俗为言”^②。他再三声明：吾侪目的，在光复中国而已。“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非情所迫也”^③。

“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

“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④。1907年陶成章等再次组织龙华会，所提章程上，对于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一概否定^⑤。1910年2月，章炳麟、陶成章在东京再设光复会总部，但他们发刊的《教育今语》杂志，宗旨是“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⑥。从那上面，找不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影子。孙中山这时正在旧金山设立中华革命党，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⑦。同盟会纲领讲的三件事，全部坚持下来了。第三，他是使中华民国见诸实现的全面实践者。在这种实践中，孙中山把建立革命团体，宣传民主共和，与组织武装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孙中山说他经历过“十次革命”，即组织过十次武装斗争。那些斗争并非都有重要影响。斗争屡遭失败，革命党内部一些人因此灰心丧气，发生争论分歧。但那些武装斗争决没有因此失去积极意义。它保持国内革命形势，鼓舞着革命党人为建立共和国去实行武装起义。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有的直接、有的间接加深了建立民主共和国思想的传播。如1906年湘赣边界起义，龚春台等宣布奉中华民国政府命，“必建立共和民

①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报》8—10期合刊。

② 《章氏丛书》别录第1卷，《杂仇是非论》。

③ 《章氏丛书》文录第2卷《官制索引》。

④ 《章氏丛书》别录第1卷《代议然否论》。

⑤ 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538页。

⑥ 《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⑦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页。

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自由幸福^①。1907年广东钦州廉州起义，王和顺发布文告，叙述他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②。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黄明堂以中华革命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说“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③。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指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与武昌起义关系密切的中部同盟会，向后倒退，抛弃“平均地权”纲领，但仍奉行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④。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它表现了和所有前面那些革命团体、武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目标的一脉相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潮流的大汇集，也是历史对孙中山与“中华民国”渊源关系的客观评价。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有一种看法，说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无关，不能认为他起了领导作用。照这样说，至少他在创立民国的关键时刻无关重要。其实谁也没有认为孙中山直接组织领导了武昌起义。那时他远在美国，从报纸上才第一次知道起义消息。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的。文学社和它的前身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分别与同盟会有组织、思想的联系。它的成员主要是新军士兵。这些士兵曾一度酝酿组织“军队同盟会”。共进会是长江流域一部分同盟会员建立的革命团体。它的誓词，把同盟会“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了，其他照旧。中部同盟会与文学社、日知会各通声气。与同盟会组织、思想存在的这种联系，就不能说与孙中山无关了。武昌起义，不但军政府宣布“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来自孙中山的口号，起义第三天(10月12日)

① 从刊《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

② 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③ 《中兴日报》1908年6月6日。

④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页。

革命党人就用黎元洪名义致电请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军政府内部某个条例议论不决，有人诡称出自孙中山在海外所手订，也就一致通过，孙中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起义者是奉他为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组织群众的。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①，这合乎事实。

再一种看法，说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建立，是立宪派而不是革命党人起领导作用，没有立宪派就不能推翻清政府。既然如此，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也就关系很少了。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追求“突破”，把一些基本事情的界限混淆了。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纷纷挂起共和招牌，极大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毫无疑问。但那与领导革命不能混为一谈。革命派与立宪派，一个主张民主共和，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坚持打倒清政府，因而遭到血腥镇压；一个死保清政府，因而受到优容。（关于此点，武昌起义廿天以后，清政府“开党禁”的诏书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②这就是说康有为、梁启超、黎元洪等都可以在赦免之列，而对革命党人则仍是需要镇压的。）一个领导革命起义，从清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一个看风使舵，从革命派手中夺取政权；一个指出了改造中国的道路，一个帮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断送了中国改造的道路……。人们不管能讲出多少具体情节，这些界线仍然改变不了。一定要改变，那就需要证明本来不存在什么革命派、什么立宪派。但历史却站在那里，使人们无法塑造出另一副样子。立宪派如果真的在那场事变中，处在领导、支配的地位，结局怎样，无法假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不会出现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

又有一种看法，说孙中山提出革命纲领，发动武装斗争，业绩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上卷，182页。

② 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338页。

并不大于其他革命党人。把他的作用讲得很重要，是受国民党“正统论”影响的“新正统论”。不错，国民党的历史书上讲孙中山，一些地方确实缺少真实性，甚不足取。最近二十多年中，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的活动提出了许多疑问，揭破了国民党一些书上神化孙中山的作法。这是值得重视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非出于天生。1892年在澳门行医，那时他还没有革命思想，更没有创立兴中会。1894年上李鸿章书，根本谈不到革命主张。香港兴中会商订誓词，据说他最初也不坚持共和主义，认为推翻清朝以后，汉族人作皇帝也可以。杨衢云提出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并与之激烈争论^①。后来他的思想跟着时代不断前进，并没有停止在一个地方不变。孙中山说他组织过十次武装斗争，而革命党人的全部活动，就远远地不止那一些。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团体都发动过武装斗争，有的行动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全国性群众起义，对于加速革命形势发展、推倒清朝统治，至关重要。国民党历史书上这些方面非真实、不全面的讲法，使人感到有一种“正统观念”横梗其中，而且不限于此。今天再因袭那种观点，就象重复封建史书上“天纵”、“天圣”一类的神话，不会有人信以为真，只会觉得可笑。现在我们是把孙中山的全部思想、活动放在时代潮流、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来考察的。一个革命阶级、革命潮流中，都会有众多的积极分子，成批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生活全面背景上有同一性，在具体环境、条件上又有差异性。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也没有办法使他们的个性、能力等整齐划一。中国外国，事实历来如此。我们说，孙中山在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有独特贡献，无非是承认这个事实。因此，不存在所谓新“正统论”一类的问题。

①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

二、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的 阶级性质

孙中山要求建立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反复讲，要建立“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要“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①。民国、共和国、或国民政府，在孙中山的语言里，它们的含义是同等的。但在共和国中，各阶级的地位、关系怎样，也就是说，它是由那个阶级领导和掌握政权的共和国，乍一看，孙中山对此没有专门论述。事实上他在阐述革命理论，给共和国制订的纲领政策里面把这一点讲得极其充分了。而且一部三民主义学说，自始至终没有哪个地方，是与他要建立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实质无关的。

西方一些观点陈旧的书上极力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台湾研究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的论著上，也说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而非什么“阶级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资产阶级革命”^②。革命既然是“全民”的，无阶级性，共和国或民国政府，当然也就是“全民”的，无阶级性的了。那些作者关心的方面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拒绝对中国革命、中华民国作阶级分析。照那个看法，“反帝反封建”也不对，据说难以确定那时中国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统治。

孙中山所要建立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根据何在？这里用不着从国体、政体说起，更不需要与古代中国、古代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7页。

② 李云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1981年9月16日台湾《中央日报》；吴家安《中共对辛亥革命之评价》，《近代中国》，第22期，1981年4月30日。

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96—97页上说，孙中山所创导的“是一种‘全民民革’”。这是他在一次宣言里使用的名词，但在哪个宣言里使用了这个名词，作者没有指出来。书上接下去引述了一些“国民革命”、“一国之人皆平等……等等”，然后便断言“凡此都可以说说明革命的‘全民性质’”。孙中山是否使用过“全民”这个词，其实无关紧要。崔书指无为有，只表示此类书的作者非常惧怕“阶级”这个词，坚决拒绝阶级分析观点。

欧洲的共和政体作不相关的比较。我们且看一系列事实。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革命，它要解决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任务。实现这两个任务，民族获得独立，中国资本主义才可以自由发展。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其中资产阶级则是首先和最多受益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前，农民发动的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运动，一个以反封建为主，一个以反帝国主义为主，它们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谁也不可能提出建立共和国的理想。资产阶级上层发起的维新运动，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当然也谈不上建立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高唱“排满革命”，在反对“洋人的朝廷”这种形式上，第一次把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正确结合到了一起。这就使扫清资本主义发展前进道路的斗争变得完全现实了。革命要反对的敌人与共和国要反对的敌人是一回事。它是发展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所需要的。因此，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其一。

孙中山领导革命，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发生在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成长的社会条件下面。辛亥革命以前，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上层资产阶级的“百日维新”，都起过重要作用，又都失败了。单纯农民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改良主义道路证明走不通。工人阶级出现了，它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子还在后面。资产阶级尽管幼弱，这时唯有它是一个新兴的比较成熟的力量，足以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此其又一。

二十世纪初年起，孙中山和他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他们对领导革命，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自觉自信。孙中山认定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①，是“平民革命”^②。“国民”、“平民”，在那些知识分子的语言中，又叫做“中等社会”。那些新型知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326页。

识分子，以“中等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他们一面批判掌握政权的“上等社会”顽钝腐败，看做是应当推倒的对象；一面又强调自己与工人、农民那样的“下等社会”不同，以为下等社会没有创造新国家的能力。“中等社会”的责任，就在于“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他们的思想认识，反映出资产阶级的觉悟性，把领导革命，建立共和国的责任承担起来了。革命领导层组成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也就是共和国的阶级属性，此又其一。

孙中山制订的革命理论中，涉及古今中外历史和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幼年熟读儒书，使他的理论中明显地存在孔学内容。但建立共和国的思想理论体系，则是采取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采取的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文章中明确地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其他学说，都不过是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义的发挥旁及。《同盟会革命方略》上讲，今天的革命与前代不同，国体民生，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在《民权初步自序》上，他说：“何谓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这一些，都是孙中山反复论述发挥的基本思想理论。如果可以否认这些理论的资产阶级性，那首先就要否定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级特性。那是谁也无能为力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又其一。

孙中山一直坚持“平均地权”的纲领，《民报》《本社简章》中，每期照例有“土地国有”一条。这突出地体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孙中山主观上以为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他把两者等同看待），中国就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弊病，不至再来社会革命了。实际上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国资本主义成长扫清基地的要求。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提出“均贫富”、“不纳粮”，太平天国提出系统的《天朝田亩制度》，它们都只反映农民小生产者平分土地的渴望，缺少现

实性。“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提出的，它虽然没有规定出切实可行的手段，带有小资产阶级空想性，却是一个触及封建经济基础的激进资本主义土地改革设想。纲领的资本主义要求，表现出了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要求，此又其一。

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各有自己最适合的政权形式。《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建立国民政府、选举总统，设立国会，民选议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相当完备。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基本上可以采用，但它们的阶级内容、阶级关系完全不同。中华民国政权的形式是鲜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又其一。

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除了组织形式上是象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它所宣布的一系列政策法令，也深深烙印着资产阶级的标记。例如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兴办实业，禁止买卖人口，废止主奴关系，改革教育制度，小学废止读经，新闻自由等等均是。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中华民国，无人能够否认它是草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此又其一。

资产阶级有官无兵。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居于主力军的地位。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主要就是领导农民。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联合农民，一为发动会党，二为联络和加入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中，农民踊跃参军，壮大起义队伍。一些省区，农民从抗租到树旗革命，宣布共和。各种形式的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因此才形成了一股席卷之势的强大风暴。从湖北军政府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立宪派不用说，革命派也迅速改变了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各省和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种种政策法令，没有一个字讲到实行“平均地权”、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相反，各省军政府悍然镇压农民运动。从湖北开始，其他地区相继效尤，对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加以“越轨行动”罪名，“一律按军法从事”，杀气腾腾。鲁迅《阿Q正传》上所说的“不许革命”，准确反映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实际。孙中山本人，在后来提出

“扶植工农”以前，并没有坚定地依靠农民群众的认识。武昌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不是农民的，也不是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权。这个共和国，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又其一。

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来作出论断的。

关于辛亥革命是所谓“全民革命”，因而革命所创立的共和国是没有阶级性的那种论点能否成立，人们复核这种种事实，就不难自行作出判断了。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发表的言论，制订的革命文献，强调反满，强调反对满人陵制汉人。他不讲“全民”革命，而讲四万万人革命。四万万人中至少三万万五千万人以上是“不准革命”的农民。孙中山当然无此看法，但也没用“全民革命”来混淆视听。

阶级分析，告诉人们深入认识历史上各种社会势力的地位和作用。本世纪初，中国需要和可能由一种新兴社会力量领导国家政权，来解决民族独立，国家步入现代世界行列的问题。孙中山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他自觉地站到了时代先驱者的位置上。可惜他毕生奋斗，最后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革命尚未成功。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命运最后究竟如何。

三、中华民国政权状况的考察

孙中山未能及生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中华民国的全部历史究竟如何呢？

中华民国的历史极其复杂。一个简单提问：三十八年间号称“中华民国”的政权究竟有多少，也似乎不容易回答。这一点，就表现出了中华民国历史的复杂性。

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是头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接下去有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云南护国军政府，孙中山广东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府、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广东——武汉国民

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陆海空军大元帅政府，蒋介石南京——重庆——南京政府，阎锡山、冯玉祥北平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我们一口气列举出这么些政权，它们无例外地都叫“中华民国”，而且还没计入区域性、地方性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一种是周代春秋以前，名义上周王朝“大一统”，下面诸侯并立，各自为政。一种是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后五代等，各立国号，互不统属。又一种是秦汉隋唐明清，同一国号，基本上同一政权。“中华民国”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它们彼此对立，又都宣称自己“合法”，或者以全国中央政府自居。彼落此起，纷纷扬扬，这真可以叫做历史上的“异数”。

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时，就明白指出了中国存在真共和假共和的问题。他说，中国改行共和，已经六年，国民没有享受到共和的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要救国救民，唯有实行真共和^①。如何区分孙中山所说的真假共和，从形式上谁也找不出某种简单明白的标志。例如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取得地方承认，叫做“奉正朔”。民国期间，各个政权都奉“中华民国”为“正朔”，但它们互不承认，以至互相讨伐。近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国际承认与否，常常被看做一条依据。但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首先就没有一个外国承认，而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的政权，又都有外国承认。孙中山的共和国与三民主义理论相联系，但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就很少宣传三民主义，蒋介石“剿共”“戡乱”、汪精卫的傀儡政权直接反对三民主义，却口头上天天讲三民主义。诸如此类，要从形式上找到真假共和国的区分是徒劳的。孙中山所说的真共和与假共和，是讲的一个徒拥虚名的“中华民国”，一个实质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1072页。

民国时代，中国是否建立了一个真共和国、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或在什么程度上说有过那种共和国？归纳一下所有叫做“中华民国”的政权，显著地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形。请先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分别简要考察，然后再看答案。

头一种情形，孙中山直接领导、主持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到广东非常政府。

南京政府只存在短短三个月，但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共和国这种新鲜事物，从此终于存在下来了。这个功劳是显著而巨大的。各种历史书上讲的很多，这里不必详述。但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派与立宪派、旧军人的联合政府。一开始，它对帝国主义是妥协的，对封建势力也是妥协的。而且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移交出去。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主张，也只有在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后不久，才又重新提出来，并在研究“社会主义”学理的名义下加以发挥。南京临时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任务。护法军政府以维护《临时约法》相号召，孙中山马上被北京的中华民国下令通缉。艰苦撑持了八个月，被他所联合、依赖的地方军阀赶出广东了。非常大总统主要依靠加入过同盟会，并在“护法”运动中实力膨胀了的陈炯明支持。一年以后，又由于陈炯明叛变而垮台了。如果南京临时政府由于开创民国，造成了一番新气象，这两次广东政府带来的就只有失败的教训。广东非常政府失败以后，又怎么样呢？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通过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直到这时，孙中山仍强调指出：“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彷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①。改组国民党，国共合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8页。

作，掀起了1924——1927年的大革命。大革命开始所建立的广东、武汉国民政府，势力所到的地方“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政府三次发表农民运动宣言，规定二、五减租。两湖农民运动兴起，影响扩及其他省区。广东——武汉国民政府，是革命以来，头一个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真正付诸实行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谱写出了极富光辉的一页。但孙中山1925年不幸逝世。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背弃孙中山的纲领政策，清党反共，另立政权。孙中山亲自领导、主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最后落空了。

云南护国军政府也在那里讲一下。它不属于孙中山主持的中华民国，是梁启超、蔡锷等发起反袁的权力机构。那时人们对政权采取共和制或君主制，叫做“国体问题”。“护国”就是护中华民国，反对袁世凯改君主国，帝制自为。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那篇带有宣言性的文章里，明白宣告了它的任务目的。梁启超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①。护国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就在维持现状。因此，袁世凯一死，讨袁的军务院自行撤消。护国一役，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名义，同时也避免了因“国体问题”而再次闹出一场民主革命，当然更没有出现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再一种情形，袁世凯以下北洋军阀的各个政权。

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最初表面上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相衔接。实际上它的统治基础与清朝末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差别很小。1913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接二连三，解散议会、撕毁“临时约法”，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表明他的“中华民国”与粗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气象的南京临时政府“法统”决裂。很快，袁世凯又由正式大总统而终生大总统而大皇帝。资产阶级革命派里，原来还有人幻想在袁世凯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86页。